

# 多维社会资本交融与近代女性 公益组织的生发

——以清末广州“公益女学堂”为例

武洹宇

(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与既往对晚清公益的研讨多限于男性组织的研究不同,选择广州“公益女学堂”作为个案,发现当时投身公益的晚清女性,绝大多数出自绅商阶层。正是基于地缘、学缘和阶层等交往形成的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基于同道中人的理解、欣赏和信任而产生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在同一群亲友型志士群体中深度交融,为当时不被主流社会所容的有志女性生产出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平行世界”——既是女性公益事业生发之初最现成的组织依托,又是其存续和发展最关键的抗风险系统,遂提出多维社会资本交融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女性近代公益组织的生发机制。事实上,这样一种集多层次社会资本于一体的亲友型志士网络广泛存在于近代中国变革的肌理之中,尚有待于未来更多深化和拓展。

**关键词:**晚清;多维社会资本交融;亲友型志士网络;女性公益组织;杜清持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22)05-0030-11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22.05.003

## 一、问题的提出

1904年,一间以“公益”冠名的女学堂出现在广州西关,创办者为女志士杜清持。在当时,“公益”一词是新生语汇,主要表达爱国合群之意。这所开风气之先的女校究竟有着怎样的“公益”属性?杜清持又是怎样一位女子?她有着怎样的家世、能力和资源,能在女性无法独自出门的晚清省城,做到登台演讲、发表论说、创办女校的?一系列的具体问题,无不触及由晚清女性主导的中国近代公益组织如何生发,交织着中国女性身份的近代转向与晚清“公益”的现代性内涵两条线索之间的互动逻辑。因此,学界对这一问题尽管还没有形成专门研讨,但在中国妇女史与公益慈善史的研究领域均有一定涉及,积累了许多相关的代表性成果和观点。总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两个大类。

**收稿日期:**2022-09-2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公益观念研究”(20YJC840031)

**作者简介:**武洹宇,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公益慈善、近代文化史等研究。

第一类是从妇女史的研究角度,将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参与社会事务的议题,置于晚清以降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解放运动进程中。公益慈善也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一部分被学界关注,但往往只论及晚清女性参与济贫与赈灾的组织性行为,如闺阁赈捐局、中国妇人会以及红十字会<sup>[1]</sup>,几乎没有将兴女学纳入“公益”范畴,而是单独列作另一个研究门类。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晚清“公益”观念的具体视野长期缺乏清晰认识,导致实际是同一回事的历史实践,经常会在当代学术议题的分门别类中被人切割,有碍于对晚清“新女性”生活世界完整性的获知。

第二类是从慈善史研究的角度,将女性的慈善活动置于传统慈善转向近代公益的背景之下,指出这一时期的女性慈善呈现出“由个别、分散向群体性、组织化行为发展”的特点,同时慈善观念也“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sup>[2]</sup>。这种“自觉”的内核,即是在“合群救国”理念影响下开始产生的“女国民”“女志士”等意识,故将“参与社会慈善事业看成自己应尽之责”<sup>[3]</sup>。但尚未有研究论及这种现代的“女国民”的认同与当时女性公益慈善事业开始呈现的组织化现象之间究竟有何种关联,以及它们在整个晚清中国的现代转型进程中处于何种位置。

近年有关晚清公益的最新研究表明,上述问题与当时流行的群学理论直接相关。与今日泛指公共利益的当代含义不同,当时新生的“公益”语汇脱胎于图强求变的时代语境,多用于特指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图强求变的根本方式,在于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改革,亦即从君主专制转向现代民主政体,开议会因此成为新制度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这便要求普通大众具有参政议政的能力和习惯。在绝大多数百姓仍不识字的晚清中国,这一目标显然难以实现,需要逐步分解。首先,是唤醒每一个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和公民担当,主要通过启迪民智、开办新学、宣讲时事等手段,其次,还有通过成立各种会社,从中培养民众的自治能力,使之“能合群”,养成民主议事的能力和习惯。因此,当时主张变革的行动者,无不纷纷成立组织,一方面通过教育启迪民智,另一方面通过群团培育民主,逐渐发展出学会、学校、报纸三位一体的组织构造,希望从中推动政体的近代转型,实现强国目标。这样一种民间建设国家的道路,梁启超谓之“公益之道”<sup>[4]</sup>。

从这个意义上看,以兴女学的组织化实践来培养女性国民,正是近代中国公益发轫之初的核心要义,但这样的实践无疑与传统世界对良家女性的角色要求产生诸多抵牾,因此兴女学的实践早期是由男性主导的,比如最早由国人自办的“中国女学堂”,倡导者与发起人便是梁启超和经元善<sup>[5]</sup><sup>13</sup>。那么,同时期由中国女性主导的女学公益组织,究竟何以可能?学界对此尚无专门的个案探讨,致使近代中国公益起源问题的研究图景长期缺乏相对平衡的性别视角。杜清持在广州创办的“公益女学堂”不仅是最早以中文“公益”冠名的女性组织,而且是粤地最早的国人自办女学之一,是承接上述问题意识的一个绝佳案例。

据冯自由所载,广东国人的自办女学,始于1902年杜清持在西关创办的女学堂和女医张竹君在河南倡办的育贤女学,当时《岭海报》甚至将二者进行对比,发表了“杜清持程度优于张竹君”的论断<sup>[6]</sup><sup>39</sup>。时至1903年,仍是“各省女学堂未兴,惟上海、广东有之”<sup>[7]</sup><sup>392</sup>。迟至1907年,清廷学部才颁行《奏定女子学堂章程》,可见杜清持的办学意识远远超前于官方的制度革新,不仅在岭南独树一帜,即使放眼全国,也是破天荒的创举。

正因如此,杜清持及其女权思想很早就吸引了学界的注意。早在20世纪90年代,已有学者关注,至今相关论文及著述多达近百项,但绝大多数是将其作为当时的女界先锋和岭南女权的代表略为提及,一点而过,对其思想和办学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学者,实际仅有李兰平、夏晓红和黄湘金三位。其中,李兰萍专门梳理了杜氏的女性观,指出“其主要核心为女子人格独立”,并细分为“鼓吹男女平等”“宣传经济独立”“提倡兴女学”和“主张禁缠足”四项内容<sup>[8]</sup><sup>163-164</sup>;黄湘金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一篇杜氏以“移风女士”为笔名的珍贵自述,题曰《倡办广东女学之回忆》<sup>[9]</sup>,澄清了有关公益女学的前身、创办时间、早期发起人以及后来与坤维女校之间的种种关系;夏晓红则在对晚清小说《广东新女儿传奇》的论

析中,考辨出杜清持办学即为小说原型,并简要考察了杜氏的番禺籍贯及其丈夫曹有成的任职履历。<sup>①</sup>

在这些重要的研究基础上,笔者有幸购得《城南杜氏家谱》四卷,辅以友人黄大德先生私人收藏的《邓芬师友录》与《邓尔雅师友录》手稿,获知了杜氏家族颇多珍贵信息,得以细致了解这位被时人誉为“贞德之返魂”“威拉之化身”<sup>[10]</sup>的杜清持究竟在怎样的家庭中成长,嫁给了怎样的夫家。尤其在她明确产生兴女学意识的戊戌政变时期,她的丈夫、兄弟姐妹,乃至同辈亲友都在关心和谈论什么?这些人做了怎样的选择,具体如何行动?他们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又在杜氏后来的办学活动中以何种方式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对这些具体问题的深入探索,有助于我们真正回到晚清岭南“新女性”生活世界的历史情境,在公益慈善史与妇女史研究领域的相互贯通里,敞开一个更为丰富的社会图景,从中开启对中国女性近代公益组织生发机制的结构研讨。

## 二、杜清持家族及婚姻情况

对于杜清持的出身,至今没有专门考证,一般只泛称其为“世家女”<sup>[11]40</sup>。笔者在友人所藏《邓芬师友录》(未刊稿)中回忆邓尔雅的篇目,偶然读到“杜清贻妹妹杜清墀”的字句,<sup>②</sup>联系冯自由所述“广州有女教育家名杜清持者……与杜鹿笙杜枚叔为兄弟行,时与其妹月波创设广东女学堂于西关”的叙述<sup>[6]220</sup>,可知杜氏兄弟名讳字号有“清贻”“鹿笙”“枚叔”。《邓芬师友录》在论及邓、杜两家的关系时,又披露了“棗弟鹿生、眉叔纯与仲韩二伯父过从甚密”的讯息,综合可知杜清持的兄弟“鹿笙(生)”“枚(眉)叔”有一位共同的兄长“棗”,而被称作“杜清墀”的女士亦有一兄长杜清贻,二者是否为同一人呢?笔者在《城南杜氏家谱》第三卷,找到了明确记载:“二十世名棗,字恭懋,号清贻,乃仙裳之长子也。”<sup>③</sup>

由此可以确定,杜清贻确系“棗”,是杜鹿笙、杜枚叔和杜清持的共同兄长,故可知“杜清墀”即杜清持,又作清池、青持,号移风女史,亦作移风女士<sup>[12]</sup>,出自番禺城南杜氏家族,父乃十九世公杜仙裳。这是一个世居省城南郭的仕宦大族。首代为十二世祖尊一公,于明末清初之际,从南海县西樵大果乡迁至广州,第二代今鸣公于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在省城南关回龙社置业定居。从第五代,即十六世始,杜氏族人开始频繁获得朝廷敕封,到了第七代,即杜清持祖父杜缙光所在的十八世,不仅出了举人,也同举人家族开始联姻,是城南杜氏最鼎盛的一代,谢兰生称“省会附郭而居者,城南推杜氏为大家,衡宇相望,延广几及一里”。<sup>④</sup>

杜清持的祖父杜缙光尽管不是举人,但也获得了布政司加四级诰授朝议大夫、覃恩诰赠奉直大夫的封号以及盐提举衔广西补用通判生的资格。杜缙光有三子,长、次皆无功名亦无后嗣,三子杜仙裳是最出人头地的一位。1879年(光绪五年),杜仙裳获赏通判,并加盐提举衔,同时指分广西,覃恩诰授奉直大夫,历署浔州府武宣县事、柳州府融县事、桂林府盐运水利同知事、浔州桂平县事等职,还曾援剿越南边匪、督办蒙江厘务、筹办直隶天津赈捐,1893年(光绪十九年)奉旨赏顶戴花翎,1894年(光绪二十年)获广西知州候补,被时人誉为“南中吏才第一”,次年卒于任上。他总计有子十名,女三名。十子当中,六位早殇,所以杜清持的兄弟实际只有四名,即长子杜清贻、五子杜鹿笙、八子杜枚叔(又名杜纯)以及九子杜蓬苑。<sup>⑤</sup>家谱中没有记载三位女儿的名字,亦无生卒年或婚嫁情况等相关信息,目前仅知一

<sup>①</sup>杜清池,亦自署杜清持,号移风女史,广东番禺人。夏晓虹.晚清戏曲中的“新女儿”——三篇传奇内外的人物.中华文史论丛,2020(2):21-22.

<sup>②</sup>邓芬师友录.未刊手稿.黄大德提供,特此致谢!

<sup>③</sup>城南杜氏家谱(第三卷),手抄本,故无正式出版信息。

<sup>④</sup>城南杜氏家谱四卷本,手抄本,故无正式出版信息。

<sup>⑤</sup>城南杜氏家谱(第三卷),手抄本,故无正式出版信息。

位姐妹芳名“月波”。<sup>①</sup>

据夏晓红的考证,杜清持的丈夫为“曹有成(1884—1927),字驾欧,号履冰,广东顺德人。清末或曾赴日留学,做过广州《时敏报》主笔。民国后,先后任沪北工巡捐局局长,浙江武康、平湖、龙游县知事(其中平湖为两任)等”<sup>[12]</sup>。笔者据此对顺德曹氏展开调研,发现清代的顺德曹氏实际有三种不同来源的房支,分别是:桃村房、南水房和白藤房(新中国成立后划归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如今三房均无完整族谱,难以从中查证。从清代广州曹先贤祠修建的捐款情况来看,桃村房捐款高达三百三十两白银,而南水、白藤两房分别只捐二十二两,可见经济实力悬殊之大。<sup>②</sup>此外,1874年第三批官派赴美留学幼童中的曹嘉祥、曹嘉爵亦出自桃村房。<sup>③</sup>曹嘉爵留美期间不幸亡故,曹嘉祥则先后进入华文学校和圣克劳大学学习,1881年回国后,又入天津水师学堂继续深造,毕业后供职北洋海军,历任“镇远”铁甲舰枪炮大副、烟台水师提督署提调、北洋海军兵备处一等参事官等职,1894年参加中日甲午海战,在作战中负伤多处。1902年,曹嘉祥以钦加副将军衔出任天津巡警总局首任总办,被誉为“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始人”<sup>[13]369</sup>。

曹嘉祥的成就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桃村房在顺德曹氏的突出地位。因此,能在19世纪90年代与蒸蒸日上的“南中吏才第一”之女联姻的顺德曹氏,大概率出自最为显赫的桃村房。既往研究表明,类似桃村曹氏这样在鸦片战争前后便具有“双重视野”<sup>[14]</sup>的洋务、买办、华侨家族子弟,大量在清末民初之际投身各种变革活动,曹有成也是其中之一。戊戌前后有关他的各种报道,均称其为“志士曹驾欧”<sup>[6]220</sup>,足见当时他是公开支持维新的行动者。在杜清持后来的办学活动中,他也始终是最坚定的支持者。

### 三、杜氏兄妹与晚清省城志士

1895年春,中日《马关条约》的内容引发“公车上书”,但士子们的请求终被拒绝;4月,《马关条约》如期签订;6月,杜仙裳病亡。<sup>④</sup>短短数月,历经国事、家事的二度重击,被寄予厚望的长子杜清贻<sup>⑤</sup>自此不再参加科考,“以教读自给……于经史、舆地、志乘、掌故,旁及天算、动植之学无所不窥,而关于边塞、版图、交通、互市诸记载尤为注意……”且“颇喜言变法改革”。面对改革,杜清贻虽支持康梁,却也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独到见解,比如纪年。当时新旧历法之争纷纷聚讼,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率众弟子尊孔,以孔子生卒年为纪年,杜清贻“颇不谓然”,认为纪年应“无邦国、种族、宗教、政治之私见”,方能“大公无我,世界大同”,遂自创干支纪年。面对个人生活,杜清贻无子,仅有二女,妻死后不复续弦,如此“不以子息为念”的态度,给好友邓尔雅留下了深刻记忆,是那个年代罕见的开明。<sup>⑥</sup>杜清持与这位精神独立、思想趋新的长兄走得很近,而杜清贻也正是粤省最早创办新学的时代拓荒者之一。

在父亲去世的第三年,“公车上书”酝酿的巨大政治能量终于爆发,一场变法轰轰烈烈地拉开序幕,却很快在屠杀的残忍中谢幕。杜清持曾在自述中明确表示,自己产生兴女学的意识,即是在血腥的

<sup>①</sup>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220。另可见江竞厂:《读杜月波女士诗草作此赠之》。(续出)女学报,1902(8)。

<sup>②</sup>参见广东顺德桃村永思堂编:《曹氏族谱》,该谱蒙曹树潮先生惠赠,并提供多条重要历史线索,特此致谢!

<sup>③</sup>曹嘉祥、曹嘉爵在留学档案上登记为广东顺德横圩村人,“横圩村”即为顺德桃村旧称,亦作“横岸村”。参见《游美留学同人姓名录》,李恩富著,唐绍明译;我的中国童年//珠海市委宣传部编。容因与留美幼童研究(第三册)。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72-73。

<sup>④</sup>城南杜氏家谱(第二卷),手抄本,故无正式出版信息。

<sup>⑤</sup>据《城南杜氏家谱》第三卷记载杜清贻科考具体情况为:“邑廪生,于光绪十年甲申年,科考蒙江西布政使前广东广州府萧岷山方伯韶录取,府考全案第十一名,宗师叶恂如学士(大焯)取进县学,广额第三名;十九年癸巳科考蒙宗师徐太史琪录取,经古前列,曾备中数次。”

<sup>⑥</sup>邓尔雅师友集,未刊手稿,故无正式出版信息。黄大德先生提供,特此致谢!

“戊戌政变后”。<sup>[9]</sup>浓重的政治抑郁无处不在,所幸杜清持并不孤独,她常常与长兄一起,前往永清门外太平沙的邓宅,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友人相聚清谈。这所邓宅的主人,有一小儿,便是后来被张大千盛赞为“现代岭南唯一国画家”的邓芬<sup>[15]213</sup>。据《邓芬师友录》所述,那时常来聚会的还有邓尔雅、陈诗仲、马励芸和张竹君。<sup>①</sup>

邓尔雅是近代南粤的书法篆刻大家,其父邓蓉镜为同治甲子举人,辛未翰林,历官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等职,三次诰命授资政大夫,晋授荣禄大夫,加二品衔花翎<sup>[16]161</sup>;陈诗仲曾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弟子<sup>[17]</sup>,清末留学日本,后加入兴中会,任香港《中国日报》、新加坡《图南日报》主笔,与杜清持之妹杜月波有婚约,可惜早逝;<sup>②</sup>马励芸是顺德清代名儒马朴卿的孙女<sup>[18]47</sup>,善诗词,<sup>③</sup>亦是杜清持后来办学的主要合作者之一;张竹君出身十三行富商之家,叔祖父是大名鼎鼎的“茶王”张殿铨<sup>[19]72-76</sup>,父亲张世蒸,曾任分省试用县丞,精通数学与测量知识,著有《弧三角法》《测量备要》等书<sup>[20]</sup>,张竹君自己当时就读于羊城博济医局<sup>[21]</sup>,毕业后独立开办诊所,附设女学,是与杜清持齐名的岭南女学先驱,时人誉之“妇女界之梁启超”。这群出自绅商大族、关心时事、支持变革的年轻士人的聚合,孕育了粤省最早的两个新式学堂和后来的国人自办女学堂。其中,两个新式学堂创立于戊戌变法同年,一为启明小学,一为时敏学堂。

启明小学由杜清贻、邓尔雅、陈诗仲等人联合发起<sup>[22]195</sup>。他们“首改私塾为启明小学,所定学科章程,后起公私诸校多仿效之”。<sup>④</sup>这不仅是两粤最早的新式学校,而且由杜清贻“独资创办……垂十余年,历蒙当道奖许,造就人才不少。”<sup>⑤</sup>邓芬的兄长邓雨亭当时也在启明就读,因为校长杜清贻不仅与邓家是“太平沙西约老坊中仁里”,而且还有“姻戚远亲关系,菜弟鹿生、眉叔纯与仲韩二伯父过从甚密”。<sup>⑥</sup>据邓芬回忆,邓尔雅、陈诗仲,还有两位杜家兄弟鹿笙、枚叔,当时均在启明任教。杜鹿笙生于1881年,早年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后任教于辅仁大学<sup>[23]3</sup>;杜枚叔(又名杜纯)生于1886年,前清花翎二品衔,江南特旨道,历充南洋劝业会办、甯省铁路会办、督辕文案等差,民国后任国务院顾问、上海军事善后帮办、上海捻工巡捐局局长、淞沪护军使署秘书长、财政部参事、杭州关监督浙江财政厅厅长、两浙盐运使节制苏浙两属水陆缉私各营、两淮盐运使节制淮南淮北水陆缉私全军等职。<sup>⑦</sup>概言之,在杜清持的四位兄弟之中,就有三位早在戊戌时期投身开启民智的新式教育。

时敏学堂则由邓家让、邓家仁兄弟以及陈之昌、黄景棠共同创办。学堂“延聘教习,教授国文、英文、日语、算术、历史、地理、物理、化学、体操、图画等科”。<sup>⑧</sup>其中,台山籍南洋富商之子黄景棠(字诏平)为主要出资人之一。<sup>⑨</sup>事实上,就在时敏创办的前一年,几位创办人还参加丁酉科(1897年)的广东乡试,<sup>⑩</sup>黄景棠考取拔贡,于变法那年进京朝考,获授知县。对于18岁始“补佺生,由是而附生,而监生,

①邓芬师友录,未刊手稿.故无正式出版信息。

②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220.此外,邓尔雅在《新闻记者陈诗仲遗像》中亦言:“妻杜,亡友杜清贻之女弟,无子,以犹子为嗣。予初识之于清贻家,翩翩少年,而又恂恂儒者也。”华星三日刊,1930-5-10。

③丘逢甲在1900年所作《诏平以三十自寿诗见示,长句补祝》的自注中道:“诏平妇能诗。”丘铸昌.丘逢甲交往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81.此外,《女子世界》第10期亦刊有马励芸《赠陈擷芬女士》诗一首:“满腔热血女元龙,扶植坤维亚细东。从此神州开草昧,女儿花灿自由红。”

④邓尔雅师友集,未刊手稿。

⑤城南杜氏家谱(第二卷),手抄本,故无正式出版信息。

⑥邓芬师友录,未刊手稿。

⑦城南杜氏家谱(第三卷),手抄本。

⑧据黄景棠《倚剑楼诗草·泉清集·乙亥纪年》之十二,明确记载“与同仁倡建时敏学堂”,《倚剑楼诗草》,1903年印本。

⑨邓家让致黄景棠函,《倚剑楼藏札》,崇正秋拍,2018年12月13日。

⑩丁酉科广东乡试题名全录,申报,1897-10-14(3),该文无作者。

而增生,而廪生,而贡生,备历生员苦况”<sup>①</sup>的科场中人来说,终于在28岁取得不俗成绩,实为不易。然而黄景棠却选择辞不赴任,转而投身新式教育。笔者在丘逢甲的一首祝寿诗中发现,黄景棠曾是公车上书的直接参与者。<sup>②</sup>邱捷亦通过对黄氏诗歌的考辨指出,“他在北京时,变法维新运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当时他与康有为、梁启超是否有交往未查到记载,但他至少是一位同情者”<sup>[24]</sup>。在后来对维新失败的回忆中,黄氏写道:“时事涛张,骇心褫魄,贤人君子,相率而去……”<sup>③</sup>这其中,也包括了选择离开体制的自己。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常往邓家清谈的女志士马励芸,正是黄景棠之妻。在后来岁月中,这对夫妇成为杜清持办学的重要支持者。

#### 四、多维社会资本交融与女学组织的生发

1900年,发生庚子事变。清廷为挽回人心,宣布实施新政,曾经的变法建言又被重新拾出。新政的目标是立宪,开设议会迫在眉睫,这便要求国民具有参政议政的能力和习惯。但中国的现实显然与此相去甚远,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尚不识字,更毋遑论参评天下大事。一时间,百姓“蒙昧”问题成为最热门的公共议题,不仅被视作实现政治转型的根本所在,而且被当成义和团迷信的首要归因<sup>[25]</sup>。维新志士曾经倡导的开启民智、培养新民被再度提出,并且迅速成为清季十年最为强劲的社会风潮<sup>[26]</sup><sup>15</sup>。

自1901年始,以开启民智、移风易俗为宗旨的各种学堂、阅报社、宣讲所等机构社团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这一年,在兄弟办学中耳濡目染了近三年的杜清持,终于将自己对女性启蒙问题的思考泻于笔端。一篇题为《女子亟宜自立论》的论说文刊登于梁启超所办的《清议报》上,开篇即振聋发聩地问道:“岂女子独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乎?均是人也,亦具五官百体,亦衣亦食”,随即言辞犀利地指出中国社会将女子“视若玩物,俨如废人”,导致全国“四万万废者居其半”,如此怎能与西方国家相竞争?因此女子必须自立,然“自立之法何,设女学、阅报章、交游广、知识多,而已。盖欲阅报章,必由女学始”<sup>[27]</sup>。

抓准了着力的方向,杜清持很快行动起来。1902年,她便以“所寓斗室”开办“移风女学校”,旨在“娶移易禁锢之脑筋,而首开改良之风气”,最初仅有两位侄女就读,后来陆续增加几位,可见只是带有家塾性质的小班办学。不久,杜清持再度发表《论办女学当先开演说会》一文。值得注意的是,杜氏两度发表的论说文,事实上“是一种由男性文人垄断的文体,最有名的例子便是男性文人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准备的八股文。……在19世纪末期以前,几乎没有女性撰写论说文。大部分能读会写的才女多以撰写诗词为主,偶尔会写一些散文、游记或者弹词”<sup>[28]</sup><sup>237-238</sup>。为学界关注最多的晚清论说文女性作者吕碧城,最早一篇发表于1904年5月,晚于杜清持三年。秦方的研究指出,正是这样一种“论说女性议题但并不预设女性为读者”的能力,极大地彰显了一种自我革新式的才女形象,很容易吸引志同道合的读者前来共同谋事<sup>[28]</sup><sup>235-236</sup>。经由现代媒体连接社会资源的逻辑,也同样作用于杜清持的个案当中。

《论办女学当先开演说会》发表不久,时敏学堂的两位教习龙伯纯、汪千仞便读到该文,顿时心生感佩,特来拜会,并与杜清持约定每逢“星期假日”,在时敏学堂开办演说会<sup>[9]</sup>。是年8月21日,“女学演说会”正式创立并开办第一场会,“首邀杜清池女史演说”,杜氏“初操粤语,后用官音解述”,到场者有四十余人。<sup>④</sup>时至第三场会,<sup>⑤</sup>龙志泽、汪千仞、胡汉民等人当场为女学劝募筹款,“即席得数十金作临时

①黄景棠自注语句,出自黄景棠. 倚剑楼诗草·泉清集. 1903年印本. 属自印文集,无正式出版信息。

②丘逢甲在1900年作《诏平以三十自寿诗见示,长句补祝》曾自注“诏平曾上书公车间”。丘铸昌. 丘逢甲交往录.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281.

③黄景棠:“序”. 倚剑楼诗草·泉清集,1903年印本。

④文明盛会:续出女报,1902(6):1B. 原文无作者。

⑤笔者在1902年《女学报》中得见“杜清池女士在广东演说稿”全文一篇,但尚不确定是第几场演说会的发言,且作资料记录于此。陈撷芬:《女学报》1902年第二卷第1期,第13-16页。

试办费”,遂于西关多宝街赁专门场地,免费招生,开办“广东女学堂”<sup>[9]</sup>,9月15日正式开学。<sup>①</sup>

一年之内,从非正式的家庭式办学到拥有专门场地的组织化办学,龙、汪二人的作用关系重大,以致曾有时敏学堂的学生认为是“伯纯先生与千仞先生于讲学之暇,倡办广东女学堂”<sup>[29]368</sup>。龙伯纯是广西桂林人,本名应中,后改名志泽,丁酉科(1897年)举人,康有为弟子<sup>[30]82</sup>,1897年便与胡汉民等人一起,在广西首个近代中学——梧州中西学堂任教,1902年任时敏学堂教员,并著有《时敏学堂修身科讲义》<sup>[31]227-228</sup>。汪千仞,名凤翔,亦是广西桂林人,同样也是丁酉科(1897年)举人,且与龙伯纯同为康氏“圣学会”成员,是康有为的重要弟子,曾立志要在粤省“本其师承,相机传布”<sup>[32]251-264</sup>。1901年,他受岳丈举荐,携夫人与东莞举人黎庶勋同往南洋视察学务、宣慰侨胞、劝募筹款,仅数月就募得巨款逾万,返回东莞创办广东首个近代中学——东莞中学堂。

差旅期间,汪氏夫妇结识了回到南洋探亲的黄景棠夫妇。汪、黄皆是光绪丁酉科的考生,“因是同年,交谊甚密”<sup>[33]128-129</sup>。作为“地主”的黄景棠不仅陪同汪千仞到各埠巡视,而且两位夫人也私交甚好<sup>[33]128-129</sup>。回国以后,汪遂于时敏学堂担任教员。“广东女学堂”在西关多宝街的新赁校址,其实仍是“时敏”属地。当时《申报》新闻曰:“省城倡设女学堂,现议将多宝大街时敏书局暂并入时敏学堂,即以书局为女学,特聘杜清池、刘佩珍[箴]二女为教习。”<sup>②</sup>在女教习无比稀缺的晚清,这位难得的新师资刘佩箴,即是汪千仞之妻。<sup>③</sup>从中可见,“时敏”会聚了一批两粤近代教育开疆拓土的志士仁人。他们与杜清贻、黄景棠经历相似,都曾是科场中人,支持戊戌变法,之后投身新式教育,完全是同道中人,且彼此之间往往有着不止一代人的种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因此龙、汪对杜清持的鼎力支持,实际基于两种维度的深刻关系。

第一种是地方熟人社会关系网带来的亲近与信任。细观《城南杜氏家谱》,很容易发现这一家族的广西渊源由来已久。早在杜清持的曾祖父辈,已有子良公任“广西陞用县承,历署思恩府迁江县平阳司巡检监理、迁江县典史”等职,并与广西贺县知县家族联姻。<sup>④</sup>杜清持之父杜仙裳在广西多地为官长达十六年之久,因此许多子女在广西出生长大,不少成年以后仍在广西发展。这一点,尽管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但可从他们的配偶情况中推断一二。比如,杜清持的丈夫曹有成,就曾在1908年以商人身份接办贵县(属今贵港市)银矿;<sup>⑤</sup>再如,杜清持另一位兄弟杜鹿笙之妻伦云飞,<sup>⑥</sup>是岭南近代著名女词人,嫁入杜家后,即“于桂林女学任教数年,授国文、舆地学、算学,生徒百余人,咸佩仰之”<sup>[34]2078</sup>。不论是银矿开采的商机,还是作为新锐事物的女学教席,都绝非一般百姓触手可得,而必须是处在地方绅商关系网络相对中心位置的成员及其家族,方才有机会获得的稀缺资源。作为同时期的桂林士子,龙伯纯和汪千仞几乎必然对“南中吏才第一”的杜仙裳耳熟能详,甚至很可能早就与大名鼎鼎的城南杜氏相识相知。正是基于这种地缘、学缘和阶层交往稠密叠加而产生的信任、合作与互惠——即哈皮特(Nahapiet)和戈沙尔(Ghoshal)提出的“关系型社会资本”<sup>[35]</sup>,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突破传统的资源和机会,往往集中在像杜清持这样出身地方绅商大户的“世家女”身上。林南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地位力量命题(the strength of position proposition)”,意即出身地位越优渥的行动者,越可能拥有并调动多种维度的社会资本。<sup>[36]</sup>

这便联系到第二种维度的深刻关系。事实上,龙、汪二人读到《论办女学当先开演说会》一文后,决

①创设女学,申报,1902-11-8(2),原文无作者。

②创设女学,申报,1902-11-8(2),原文无作者。

③汪千仞回忆广东女学堂创办时有言:“前室刘佩箴,名祎嘉,山西洪洞人,产于桂,民国元年避乱香港,殁于鼠疫……”田正平,李笑贤编:《中国教育名著丛书: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368页。

④城南杜氏家谱(第二卷),手抄本。

⑤贵省矿务大概情形,申报,1908-4-4(21),原文无作者。

⑥伦鸾(?—1927后),字云飞,番禺人士,杜清持兄弟杜鹿笙继室,著有《玉函词》《词综补遗》等。

定造访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那便是“汪夫人刘佩箴女士,素具兴办女学之心,奈苦无同志”。与杜清持相似,刘佩箴也出自开明的仕宦之家,其父刘德恒,历任龙门知县、潮阳知府、四会知县以及两任东莞知县,支持维新变法,曾予以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不少经济上的帮助,不仅发起广东首个近代中学——东莞中学堂,而且参与兴建东莞育婴堂、兴贤书院、博济医院等多项近代公益机构。<sup>①</sup>刘氏“奈苦无同志”的心绪,强烈地表达了对志同道合者的渴求,杜氏家族不仅有多人投身新学,而且直接参与兴办女学的女性就多达三位,<sup>②</sup>再加上几个家族之间本就熟悉,不难想见其阅杜文时的欣喜与冲动。这样一种基于共同认知而产生的信任、合作与互惠,学界谓之“认知型社会资本”。<sup>[35]</sup>从中可见当时女性志士的能动作用,在社会关系网的实际运转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与她们相互支持的男性志士,也往往是与其有着至亲关系的丈夫或兄弟。因此,从杜清持开办女学的情况来看,两种维度的社会资本显然并非来自不同人群,而是经由现代媒体的传播与地方熟人社会的网络,交融在同一亲友型的知识群体之中。

## 五、杜清持事业发展与晚清民间公益的“平行世界”

从1902年9月“广东女学堂”开学,至1904年更名“公益女子师范学堂”,再到1905年与“坤维”合并,其间杜清持两次化险为夷,与其身后强大的支持系统密不可分。之所以能有这些支持,是因为女学堂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深深嵌入在认知型社会资本与关系型社会资本相互交融的亲友型志士组织网络之中,先期嵌入“时敏”,后来嵌入“述善”。

先论与“时敏”的关系。时敏既以“书局为女学”,说明广东女学堂很可能就是时敏学堂的女学部,或者至少是密切合作的兄弟机构。时敏书局开设于时敏学堂创立同年<sup>[37]220</sup>,是“为适应本学堂之需要及求典籍图书之流通推行”<sup>[38]121</sup>而附设的,与1903年创刊的《时敏报》一起,并称清末西关“三时敏”,盛极一时<sup>[39]131</sup>。许纪霖指出,这样一种学校、学会和报纸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在戊戌前后大量涌现,发起人多为年轻的读书人,即“新型的士”<sup>[40]</sup>。具体到女性领域,同样在戊戌之年即有论曰:“这女学会、女学堂、《女学报》三春事情,好比一颗果树;女学会是个根本,女学堂是个果子,《女学报》是个叶,是朵花。”<sup>③</sup>从这个角度重新检视杜清持的公益事业,便可发现她与“时敏”合作之始,就已经呈现出“三位一体”的组织格局——首先是启动女学堂的演说会,其本质便是学会,亦称“广东女学会”,发起人便是杜清持夫妇和“时敏”同仁<sup>[12]</sup>,尽管没有专门成立女学报,但杜氏丈夫曹有成实为《时敏报》的主笔,对杜氏办学鼎力支持,杜氏亦常为夫婿供稿<sup>[41]</sup>,这就有了现成的舆论阵地。除此之外,杜清持及其女校学生还频繁在上海出版的《女子世界》上发表论说,与沪上女界交流互动。因此,可以说杜清持公益事业在其组织化的一开始,便是深度嵌入在“时敏”三位一体架构之中的,并在此基础上迅速搭建起跨地域的“花”和“叶”,极大地扩展了广东女学堂的影响力,为“时敏”带来声誉。龙、汪两位时敏人士也在女学堂遭受两广学务处压迫之时,<sup>④</sup>竭力帮助杜清持度过一次风潮。

两年以后,女学堂风波又起。另一位时敏同仁——黄景棠,带领其创办的志士组织“述善”,为杜清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述善”是1897年成立的一间善堂,发起人为黄景棠、李戒欺、方桂东等绅商<sup>[42]392</sup>。1903年8月,述善同仁利用荒废的节孝祠创办述善学堂,黄景棠任校长<sup>[43]37-40</sup>。1904年,黄氏萌生开办女学的打算。这一年,王千仞让出位于逢源西街的自家宅院给女学堂,同时更名“公益女学校”。1905年春,杜清持旅沪考察上海务本女学,暑假返回广州以后,刘佩箴丁忧居家,龙、汪亦因事远游,杜

①刘氏宗谱(山西洪洞),民国二十一年版,私人收藏,非正式出版物,故无正式出版信息。

②具体为杜清持、杜月波和伦灵飞。

③潘璇:上海《女学报》缘起.女学报,1898(2)。

④批女学稟,华字日报,1904-1-19,该文无作者。



氏独自支撑女校学务,遭到反对女学势力的猛烈攻击,女校陷入危局<sup>[41]</sup>。在此“第二次大风潮”掀起之际,素与杜清持、刘佩箴交好的黄景棠夫妇“目睹情形,悯同群之窳敝”,当即令述善教员“义务出为助”,同时“爰招同志,集议于黄君小画舫斋,谋所以继续之”。1906年,黄景棠“率荷众赞助”开办的坤维女学校正式获准立案,马励芸任校长,杜清持、刘佩箴任监学,王千仞、黄景棠等人任校董,“公益”就此与“坤维”合二为一,成为“述善”的姐妹机构<sup>[9][29]</sup>。事实上,启迪民智、开办新学还只是黄景棠及其“述善”同仁们事业版图中的一小部分,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投入在以粤商自治会(学会)和《七十二行商报》(报纸)为阵地的争取国人自办粤汉铁路以及广东地方自治的事务当中<sup>[44]249-250</sup>,频频与当局叫板,以致黄景棠一度被两广总督张鸣岐冠以“乱党”之名,不得不避走南洋,直至民国成立才返回广州<sup>[45]</sup>。

作为当时最早敏于时局,共享变革理念,并勇于付诸行动的时代先锋,杜清持及其事业伙伴,乃至他们中一部分人的父辈,可谓一种“新型的士”<sup>[40]</sup>,因其所共享的精神气质、世界图景以及对国家未来的想象,与传统士大夫的认知体系之间存在显著边界。这种边界在时任礼部左侍郎的于式枚的一段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看来,杜清持身边的这类公益志士,不过是“强名曰士”,而“未尝任纳税当兵之责,乃欲干外交、内治之权。至敢言监督朝廷,或一又云推倒政府。读诏书,则妄加笺注。见律令,则至肆讥弹。胥动浮言,几同乱党”<sup>[46]337</sup>。溢于言表的不屑之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很大一部分掌握地方军政实权的传统士大夫的态度。这样一种势力构成了对于包括开办女学在内的“新士”变革活动的最大阻力,因此诸如杜清持、黄景棠这样的年轻志士必须要结成同盟,相互支持,才可能有机会与各种复杂的敌对势力周旋抗衡。

梁启超曾敏锐地认识到当时“新士”们的结盟特点,他写道:“试观数年以来,倡政治改革之人,非即倡教育改革之人乎?倡教育改革之人,非即倡实业改革之人乎?倡实业改革之人,非即倡社会改革之人乎?以实业论,则争路权者此辈人,争矿权者亦此辈人,提倡其它工商业者亦此辈人也。以教育论,则组织学校者此辈人,编教科书者此辈人,任教授者此辈人也。以政治论,则言革命者此辈人,言暗杀者此辈人,言地方自治者亦此辈人也。其它百端,大率类是。”<sup>[47]732</sup>也就是说,当时在各个领域推动变革之人,基本是同一群地方绅商阶层的世家子弟,邓尔雅、陈诗仲、杜清贻、杜清持、刘佩箴、龙伯纯、汪千仞、黄景棠、马励芸等活跃在广州西关的志士群体即是显例。他们既有着亲戚、街坊、同学等多重交错的亲熟关系,又共享着相似的变革理念和公民勇气,正是这两种重要社会关系的交融合一,导致两种社会资本的作用效力得以彼此增强,为当时不被主流社会所容的有志女性生产出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平行世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孕育了当时以学会、学校、报纸为基本架构的公共领域。这一领域所开展的启迪民智、争取路权、地方自治等主要实践,其实无不指向图强求变的国家转型,亦即当时“公益”观念的核心实指<sup>[48]</sup>。

## 六、总结与讨论

与既往将女性参与中国近代慈善事业转型的探讨,主要局限于女性捐赠、赈灾等组织化行为的现象性描述不同,本文结合概念史与微观个案的研究路径,注意到兴办女学培养女性国民的实践,事实上才是近代中国女性公益发轫之初的核心要义,并以广州“公益女学堂”这一最早以中文“公益”冠名的女性组织作为个案研究,在充分利用《城南杜氏家谱》《邓芬师友录》《邓尔雅师友录》等新发现史料的基础上,主要形成以下两个层次的发现与启示。

从宏观的逻辑来看,晚清女性参与非营利活动的现代转向,根植于当时少数出身优势阶层的女性率先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之外,还有作为现代国民的身份认同,并由此生发出与男性等同的责任担当。她们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和群团实践,以期从中开启民智、培育民主,为推动国家政体的近代转型竭尽全力。这与同时期兴起的表达爱国合群的“公益”语汇意指相一致。因此,可以说像广州“公益女学堂”

这样由晚清女性主导的中国近代公益组织,其现代性集中表现在实践主体的内在动机、活动方式和最终目标,无不是现代国家观念的产物。

从微观的机制来看,类似杜清持、刘佩箴、马励芸这样晚清时代的“新女性”,几乎全部出自地方绅商家庭,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因此能够理解变革思想,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更容易在亲戚、同学、街坊等教育背景相似的同辈亲友中,遇到既知根知底,又志同道合的事业伙伴。正是基于亲缘、学缘和阶层等交往形成的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基于同道中人的理解、欣赏和信任而产生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在同一群亲友型志士群体中深度交融,为当时不被主流社会所容的有志女性生产出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平行世界”——既是女性公益事业生发之初最现成的组织依托,又是其存续和发展最关键的抗风险系统。本文遂提出多维社会资本交融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女性近代公益的组织生发机制。事实上,这样一种集多层次社会资本于一体的亲友型志士网络广泛存在于近代中国变革的肌理之中,尚有待于日后更多的实证研究对其进行深化和拓展。

### 参考文献:

- [1]郭长海.关于中国妇人会和《妇人会章程》——与晨朵同志的商榷[J].社会科学战线,1985(3):176-177.
- [2]周秋光,庄细细.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之历史演进(1895—1945)[J].近代中国,2020(1):235.
- [3]周秋光,贺蕃蕃.中国女性慈善实践的历史与现状思考[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56.
- [4]武洄宇.中国近代“公益”的观念生成:概念谱系与结构过程[J].社会,2018(6):200-201.
- [5]夏晓虹.中西合璧的教育理想——上海“中国女学堂”考述[M]//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6]冯自由.革命逸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7]李又宁,张玉法.近代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上)[M].广州:龙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
- [8]李兰萍.辛亥革命与广东妇女[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 [9]移风女士.倡办广东女学之回忆[J].紫罗兰,1929(4):13-25.
- [10]裙钗真仆.记杜女士演说事[N].(续出)女报,1902-4-15(08).
- [11]《七十二行商报》编辑部.七十二行商报廿五周年纪念刊[M].广州:七十二行商报,1931.
- [12]夏晓虹.晚清戏曲中的“新女儿”——三篇传奇内外的人物[J].中华文史论丛,2020(2):1-42.
- [13]陈予欢.民国广东将领志[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4.
- [14]熊月之.“双视野人”与民族觉醒——以乡山人在澳门、香港和上海的实践为例[J].澳门学,2022(1):33-38.
- [15]佛山市档案局,佛山市地方志办公室.佛山历史人物论丛[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213.
- [16]黄大德.邓尔雅年表[M]//东莞市政协,东莞市博物馆.尔雅书画.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6:161.
- [17]尔雅.新闻记者陈诗仲遗像[N].华星三日刊,1930-5-10(02).
- [18]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教育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 [19]刘志伟.广州隆记茶行史事补[M]//广州博物馆.镇海楼论稿:广州博物馆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
- [20]张锡麟.张氏克慎堂家谱[M].广州:广州广印祥印务局,民国二十二年.
- [21]杨奕望,叶进.女医士张竹君之生年学籍新证[J].医学博览,2015(1):40-43.
- [22]梁凤莲.《百年城变——十九世纪以来广州的城市演变与文化形成》[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8.
- [23]黄泽盛.论杜兆植的交响诗《风雪·万里·家园》[D].厦门:厦门大学音乐学院,2007.
- [24]邱捷.黄景棠和他的《倚剑楼诗草》[J].近代史研究,1996(6):168-184.
- [25]刘宏.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启蒙[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7-15.
- [26]李孝悌.清末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1901—1911[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27]清池女史.女子亟宜自立论[N].清议报,1901-4-19(76).
- [28]秦方.“女界”之兴起:晚清天津女子教育与女性形象建构[M].北京:中华书局,2019.
- [29]田正平,李笑贤.中国教育名著丛书: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 [30]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桂林文史资料 第二辑[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

- [31] 霍四通. 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考释为中心[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32] 廖中翼. 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节录)[M]//夏晓虹. 追忆康有为.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 [33] 刘嘉伟. 广州第一间女学——坤维女学创办经过[M]//荔湾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荔文史选辑. 广州:荔湾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1987.
- [34] 孙克强,杨传庆,裴哲. 清人词话(下)[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 [35] NAHAPIET J,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2):242-266.
- [36] LIN 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75-76.
- [37] 林子雄. 古版新语:广东古籍文献研究文集[M]. 广州:广州出版社,2018.
- [38] 余少山,李蘅皋. 清末广州几家日报简介[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州文史资料(第10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
- [39] 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 西关文化[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 [40] 许纪霖. 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J]. *史林*, 2003(2):81-89.
- [41] 黄湘金. 杜清持与近代广州女子教育——从最新发现的史料说起[J]. *中国地方志*, 2020(5):80-87.
- [42] 叶息机. 广州市社会局管辖之慈善事业的研究[M]//程焕文,吴滔.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卷.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392.
- [43] 阿牧. 六十年广州社会稗史[M]//广东七十二行商报. 廿五周年纪念号. 广州: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出版,1933:37-40.
- [44] 邱捷. 黄景棠与清末广东铁路[J]. *学术研究*, 2013(3):97-104.
- [45] 邱捷. 晚清民国初年广东的士绅与商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46] 于式枚. 奏立宪必先正名不须求之外国折[M]//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47] 梁启超. 论政治能力[M]//张品兴. 梁启超全集(第三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48] 武涇宇. 中国近代“公益”的观念生成:概念谱系与结构过程[J]. *社会*, 2018(6):180-215.

##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Capital Integration and the Genesis of Modern Female 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 A Case Study on the Cantonese “Gong-yi Female Schoo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U Huanyu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Unlike previous studies on modern philanthrop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were mostly limited to male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selects the Cantonese “Gong-yi (Public Charity) Female School” as a case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women devoted themselves to public welfare at that time were born from the gentry class. The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 based on kinship, academic ties and social class and the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based on understanding, appreciation and trust were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same group of kindred people. This produced a relatively free and inclusive “parallel world” for the aspiring women, who were not accepted by the mainstream society at that time—not only the most ready-made organizational support for them at the beginning, but also the most critical anti-risk system for its survival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hen puts forward the viewpoint of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capital integration to explain the genesis mechanism of modern Chinese women’s public charity organizations. In fact, such a network of relatives and friends integrating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capital widely existed in the texture of modern China’s reform, an area which needs to be deepened and expanded by further empiric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capital integration; network of friends and relatives; female public charity organizations; Du Qingchi



(责任编辑 彭何芬)